

編後語

《二十一世紀》出刊百期了。過去的十七年中，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支持下，在各位編委、作者和讀者的幫助下，在劉青峰女士的主持下，《二十一世紀》對當代中文世界思想、學術和文化事業的發展，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貢獻。自本期開始，新的編輯團隊將為《二十一世紀》的「傳承與更新」（參見本期陳方正文）而進行「艱難的苦鬥」（參見本期劉青峰文）。

中國的金融經歷了漫長而艱難的改革開放之路。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刊出的五篇文章，從具體的問題、到制度的變遷、再到文化的制肘，在在揭示出中國金融的改革開放依然任重道遠。許多人為中國擁有巨額外匯儲備而欣喜，但是如果對這筆資產不能善加管理，就會為中國經濟埋下大的隱患。余永定縝密的分析透析出消除這一隱患的唯一之道，這就是加快改革和開放，將中國的企業投資進一步推向全球市場。就在余永定為此而殫精竭慮之時，中國官方宣布即將成立國家外匯投資管理公司，專門負責龐大外匯儲備的投資管理，朝着這一方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哈繼銘和吳華的文章具體探討了這一公司的發展戰略及其影響。何佳從三個方面對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進行了綜合評述，包括最具有中國特色的問題，即國有企業改制上市過程中的行政干預和上市公司併購中的行政行為。易憲容的討論對象則是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而其主旨則是計劃經濟制度遺產對於當今中國金融改革和發展的制約。在這裏，我們再次看到了高度行政化的制度如何扭曲了市場的規範和公司的行為。

在「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中，可以說陳志武的文章最具震撼性。他從歷史社會學的宏大角度，分析了中國金融制度發展滯後的文化根源，即儒家傳統對於家族的依賴。毫無疑問，如何發展出非個人性、非血緣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制度，這一問題不僅限於金融領域，而且也是整個市場經濟體系發展所必需面對的挑戰。當然，中國在面對這一挑戰之時所遭遇到的「傳統」的制肘，並不限於儒家傳統，而且更為重要的恐怕是以計劃經濟體制為支撐的新的「政治傳統」，也就是何佳和易憲容文章中所指的行政化力量和制度。

本期的多篇文章振聳發聵。袁偉時以對話體這一輕鬆的形式探討了一個沉重而意涵深遠的問題，即如何評價經濟民族主義。他運用大量史料說明，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外國資本進入中國，不僅沒有削弱民族資本的勢力，而且直接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以及與此相關的制度變革；相反，真正阻礙民族企業發展的恰恰就是中國的政府及其推行的制度。徐昕告訴我們，弱勢群體維權行動中種種貌似不理性的行為，絕非源於其法律意識的淡薄，根本在於法律制度本身的缺陷。羅文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政治後果作出了相當樂觀的展望；當然，樂觀的展望變成現實，尚需中國人在觀念和制度上推進更多的「範式轉換」。